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鶴見俊輔

邱振瑞 譯



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鶴見俊輔

8-986-83442-2-8

00340



344228

鶴見俊輔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邱振瑞 譯



SENJIKI NIHON NO SEISHIN SHI, 1931-1945

by Shunsuke Tsurumi
with commentary by Norihiro Kato

© 1982 by Shunsuke Tsurumi
Commentary © 2001 by Norihiro Kat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82
by Iwanami Shoten: Tokyo.

This Chinese (traditional)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2008 by
Editions du Flâneur: Taipei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Iwanami Shoten: Tokyo.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原著者：鶴見俊輔

譯者：邱振瑞

執行編輯：宋玉雯

文字編輯：姚立群、楊惠芊

美術編輯：黃瑪琍

印刷：中原造像

定價：340元

ISBN：978-986-83442-2-8

2008年1月 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者：行人出版社

106 台北市溫州街12巷14-1號

電話：886-2-23641944 傳真：886-2-23641946

<http://flaneur.tw>

郵政劃撥：19552780

總經銷：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鶴見俊輔原著；邱振瑞譯。

——初版——台北市：行人，2008 [97年]

296 面；13 x 19 公分

譯自：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ISBN 978-986-83442-2-8

1. 日本精神 2. 第二次世界大戰 3. 日本史

731.378

96019409

致台灣讀者序

本書呈現在台灣讀者之前，首先，我要以日本本地住民的身分，向一八九五年起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灣表示歉意！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這本書為了呈現當時至今住民的記憶，以及作者的愧疚，雖然論述得並不充分，但我仍努力把台灣、朝鮮、千島群島、庫頁島和南洋群島這些地方納入本書的範疇。

在移住台灣斯土成長的日本人之中，尤其在戰爭時期的日本有獨特功績的人並不多見。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些人——特別是尾崎秀實和埴谷雄高。孩童時期，他們始終無法理解包括自己父母在內的日本人為什麼不能善待殖民地時期的台灣人民？即使他們返回日本，這個記憶仍未消失。在日本的知識人之中，他們二人終其一生的活動，在精神深處顯然都烙印著殖民地（台灣）的記憶。

日本政府以戰爭為目的的「解放大東亞」，把台灣、朝鮮、千島群島、庫頁島和南洋群島的住民全納入日本的支配之下，但現今的日本政府卻昧於事實，日本國民也故意視而不見。

大東亞戰爭戰敗後的情況又是如何？整個日本仍在持續自我矇蔽。換句話說，日本人沒有對此做出清醒的反省之前，恐怕很難跟世界居民做密切的交往吧。正因為我見證過戰爭時期至戰後的種種經歷，所以我如此堅信。

正如拙著續篇《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揭示的那樣，與戰前的日本文化比較起來，戰敗後的日本文化特色在於對金錢和慾望的解放。在這股潮流中，邱永漢的賺錢術以及謝國權的男女性關係論的著作都帶給日本國民巨大的影響。儘管日本的作者也在同領域發表諸多著作，然而邱、謝二人的著作，顯然要比日本在地者的論述出色得多。其論點獲得讀者青睞的原因在於，他們並沒有把賺錢或男女的性關係建築在人壓榨人的基礎上。現在，縱使他們在日本文化論述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其著作中仍存在著長年來飽受日本人打壓的苦悶餘緒。

雖說日本和台灣同屬於漢字的國度，但對漢字意涵的掌握卻不相同。在此謹向克服箇中艱難、翻譯拙著的譯者致上謝意。

寫於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鶴見俊輔

導讀

李尚霖（開南大學應用日文系）

戰爭、現代日本、以及鶴見俊輔

一九四五年，日本對美投降，二次大戰宣告結束。然而，戰爭雖然結束，如何回顧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歷史，在日本國內始終是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延伸到東亞的地緣政治上，更變成一顆隨時會被引爆的炸彈。最為典型的例子，便是二〇〇一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首次參拜靖國神社後，引發國際社會的一片嘩然；小泉此舉，同時，亦在日本國內引起了所謂的「靖國問題」，激盪出一連串的討論。

然而，在有關「靖國問題」的激烈論辯中，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跳出正反意見的對立，指出「靖國問題」的最大問題，在於一般日本民眾不曉得「問題」在哪！他指出，由於能正確理解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為何會成為問題的日本人不多；因此，能明白問題所在並擁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參見高橋哲哉《靖國問題》，筑摩書房，二〇〇五年四月）。

高橋哲哉所點出的這個問題，由漫畫家小林善紀的作品《戰爭論》及《台灣論》這些肯定日本「大東亞戰爭」的著作在日本暢銷一時，可大概管窺一二。日本對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的世代，一般稱為戰後世代。或許是有感於戰後世代對戰爭的陌生與無知，二〇〇三年日本文化界邀請了分別任教於東京大學、慶應大學的上野千鶴子與小熊英二，由這兩位隸屬戰後世代的學者，以三天的時間，密集訪問一位戰前出生的學人，請教他對戰爭的看法，以及對日本近、現代史的體悟，而後集結成書。而這位代表日本戰前世代接受訪問的學人，正是本書的作者鶴見俊輔（參見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合著《戦争が残したもの》，新曜社，二〇〇四年三月）。

鶴見俊輔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十五歲時前往美國留學，就讀哈佛大學哲學系。鶴

見俊輔家世顯赫，父親鶴見祐輔、外祖父後藤新平，均是日本政界的大人物。然而，這樣的家世背景似乎既是他的資產，同時也是他的壓力。鶴見俊輔自陳年少時乃「不良少年」，父母親由於見他無法適應日本的教育環境，始將他送往美國留學。留學期間，美日開戰，他因無政府主義的傾向被美國政府逮捕，並於拘留所內完成畢業論文。

鶴見俊輔可說是日本現今少數可以稱得上「思想家」三字的學者之一；他與丸山真男、竹內好、吉本隆明等日本重要的知識分子，都有互動往來。鶴見俊輔除了著作等身之外，《思想之科學》這本影響戰後日本深遠的雜誌，亦是由他主導創刊。對戰爭的反思，一直是鶴見俊輔的一項重要職志。值得一提的是，鶴見俊輔除了勤於筆耕之外，同時也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六〇年代他參與日本國內反越戰運動；九〇年代，他參加從軍慰安婦之求償運動；而二〇〇四年六月，他更參與「九條會」的發起工作。日本憲法第九條明文宣示放棄戰爭、不行使武力等主張，近年日本右翼團體思忖修改憲法第九條。而所謂的「九條會」，其成立宗旨便在於反對日本右派團體修改憲法第九條的企圖，以維護現今日本憲法和平主義的精神。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鶴見俊輔並非學術象牙塔裡的學者；他除了學者的身分外，同時也是個身體力行的社會運動家。

「轉向」與「非轉向」

本書，即是鶴見俊輔早年的代表作。如何理解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戰爭？一般日本史學界將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的軍事行動區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即一九三一年的滿州事變，一九三七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以及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太平洋戰爭。但鶴見俊輔首開風氣，將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一連串戰事，視做一個整體，稱之為「十五年戰爭」。此十五年戰爭之史觀，由於能相當程度地掌握滿州事變後日本軍事擴張行動的內在關係，而有助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理解與批判，因此被廣泛採用。本書所討論的時代背景，即是這十五年戰爭時期。

如何捕捉與解析這十五年戰爭期間日本人的精神軌跡呢？作者的研究方法是將分析重心放在所謂的「轉向」現象上。「轉向」這字眼在日文中具有特殊的政治涵義。書中提到「轉向」二字在日語中之所以普及化，乃是因為一九三三年日本共產黨的重要幹部佐野學與鍋山貞親發表「轉向」的共同聲明，宣佈放棄以往反天皇制及反殖民主義等主張，轉而支持日本國策。而對戰前日本知識分子之「轉向」，歷來因研究者的不同而各

有不同之定義。在這裡，鶴見俊輔定義「轉向」為：「由於國家強制力行使的結果，造成個人或個人所屬集團發生思想上的變化。」

而為何國家權力會要脅知識分子，迫使知識分子「轉向」呢？作者認為此一現象的產生，可歸咎於日本之文化性格以及天皇制國民國家的設計上。作者指出日本江戶時代實施的鎖國政策，對爾後的日本文化性格，有著重大的影響。文化上的鎖國性，乃是因為二百多年的鎖國政策，造成日本人一方面安於自己國境之內的生活，產生了內部具「自我完結性」的感情迴路；而另一方面，與情感無直接關係的思考邏輯面，則深受外來優勢的文化與語言影響。

而這樣的鎖國性格，也影響到明治時代打造日本近代國家體制的設計師們。作者指出，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新政體，可分為顯教部分與密教部分。顯教部分尊崇日本自古以來的天皇制，以天皇為國家象徵；密教部分則取經於西方文明，以近代國民國家體制為宗。這樣的設計，是為了方便一邊在情感上統合日本傳統社會，一邊學習西方，以求迎頭趕上。

而如此的政治企圖之所以能夠成功，「國體」這一概念發揮了極大的功用。書中提到，「國體」二字最早出於幕末吉田松陰與山縣大華的論爭中。吉田松陰以「國體」二

字來指稱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精髓；山縣大華則否認這種觀點，認為如果真有「國體」這種東西，亦應是普世皆具，各國都有各自的「國體」，不應是日本特有的東西。

「國體」這一概念雖在誕生之初，並未受到全面的肯定，但在明治維新之後，卻成了維繫新政體於不墜的重要概念。作者指出，「國體」這概念，在明治維新以後演變成用來指稱當時日本政治體制的特殊性。也因此，儘管明治以後日本採行西方的國家體制，但「國體」這個概念，卻讓一般民眾產生明治以後的政治體制還是古代天皇制家天下的錯覺。

如此的顯密雙重結構，雖然成功地讓日本一舉躍入世界強國之林；但不幸的是，代表西方理性的密教部分，卻在日本國內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擴張的狀態下，逐漸被顯教部分天皇至上的主張吞沒。在這樣的背景下，「轉向」的現象於焉產生。日本知識分子在國家權力的壓迫下，有的投降、有的堅持、有的部分妥協；作者便是透過比較這些「轉向」的不同案例，來追溯與反思日本十五年戰爭期間的精神史。

然而，在作者提供史料，告訴我們大批日本知識分子在國家的壓迫下被迫「轉向」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呈現一些不肯與政府多做妥協、頑強的「非轉向」典型。而這些

「非轉向」的典型，卻多非知識分子，多半是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下層階級；有的是忠於自己宗教信仰的民間人士，有的則是混跡於日本社會最底層、但求溫飽的朝鮮族勞動者。

作者在書中引用日本左派知識分子中野重治的小說《村中的家》，為日本知識分子與民眾在面對「轉向」時態度上的差異，下了一個鮮明的注腳。中野重治本身亦經歷過「轉向」的痛苦經驗，這本小說也可看做是他個人對「轉向」的反思。小說的主角出身於日本沿海農村，大學畢業後參加左派政治組織，後來被捕入獄，在獄中被迫簽署「轉向」聲明。小說的主軸便是圍繞著主角和父親在面對「轉向」這行為時態度上的差異。主角在獄中儘管遭受拷問、禁錮，但並未因此出賣自己的友人和同志，亦並未承認自己在思想上有所偏差，只是向政府承諾不再從事政治活動。但對主角父親來說，這樣子還不夠，他認為既然兒子身為組織的領導者之一，兒子便有責任為貫徹自己的主張而死，因為有無數青年為呼應他的主張而遭受迫害！但主角卻想保留有用之身，以另一種方式反抗政府；回到家鄉後，主角繼續從事寫作，批判政府。但主角的父親無法認同主角這種慎重的政治謀略，認為主角既然無法為自己選擇的信念而死，便沒資格再提筆寫作，這才是做人的道理！

國家權力、知識分子、民眾

戰前的日本政府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大力美化、宣傳與敵人同歸於盡的「玉碎」思想之外，亦運用所謂的「鄰組」組織，讓百姓互相監視彼此。在這樣的狀況下，作者一方面以「轉向」的知識分子精神、行動上的掙扎、變化為中心，來描繪戰爭時期日本的精神史；另一方面，卻也視日本下層民眾為「非轉向」的典範，似乎不懂複雜政治謀略、只知道簡單的「做人的道理」的民眾，才能真正抗拒極權的壓迫。書中，作者雖未直接對日本知識分子有何批判，但這種對照性的春秋筆法，可以看出作者對日本的知識分子有相當程度的失望。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作者的這種隱喻式的批判並非只是情緒上的抒發或只是感傷，而是有其學理上的根據。

他以「東大新人會」這個東京大學的校友會組織告訴我們，知識分子，不管是支持政府的也好、反對政府的也罷，其實除卻他們的政治立場，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很可能都是同一路的人。因此，作者指出，明治維新所造就的日本新知識分子，其實是一種學歷社會下的新「身分制度」。引進西方文明的結果，雖使得西化的日本新知識分子在日

本社會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造成日本知識分子在反抗國家權力時無法徹底、大量「轉向」，因為日本近代知識分子在權力結構上與國家權力極為接近。因此，在國家權力擴張無度之際，日本社會中真正能挺身對抗到底的，往往不是知識分子，而是下層民眾。

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下，作者一方面重視因宗教、民族因素而抵抗國家權力的下層民眾；另一方面，亦大力讚揚戰前沒有投票權的日本婦女。在討論戰時日本的日常生活一章中，作者敘述戰爭末期，由於大半男丁都被國家徵召，日常生活百般大小事，全賴婦女張羅。作者指出，由於戰時日本配給制度的不合理，日本婦女不得不從事黑市買賣，違反國家法律，以維持一家生活所需。他讚揚這些婦女，「避免與現存國家秩序正面衝突，但仍遵守超越公認秩序的道德與習慣」（參見本書頁一八四）。而這種「超越國家公認秩序的道德、習慣」，在作者看來，似乎正是日本未來的希望所在。作者指出，戰後的日本各地出現自發性的反政府運動，而這種非由知識分子主導的運動，「已由內部衍生日股力量，要與向來代表日本文化特徵、此後也將留傳後世的鎖國性格戰鬥下去」（參見本書

頁二四）。

小結

作者受過嚴謹的哲學思考訓練，本書可能的缺失，諸如以近、現代史為研究對象時所面臨的困境、「轉向」研究的侷限等等，作者已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中，盡皆夫子自道，筆者在此不用贅述。然而，即使本書如作者自述，在史料的抉擇及方法學上存在若干問題，但在探討日本思想史與精神史的研究上，本書的重要性卻是毋庸置疑的。

本書的特殊之處，首先，在處理「精神史」這一看似專屬文化菁英的題目時，作者除重視在文化上佔有發言權的知識分子之外，觀照的對象亦擴及一般民眾。這種在思想史研究上注重民眾思想、精神的態度，乃是戰後日本學界在歷史研究上的一大突破。二戰結束初期，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日本的歷史學的研究中舉足輕重，佔有領導地位；然而，一九六〇年代以後，色川大吉、鹿野正直、安丸良夫等日本學者，對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過度強調上層結構的歷史觀，抱著強烈的不滿與懷疑，起而發掘底層民眾的思想和精神。

其中，色川大吉的著作《明治精神史》在一九六四年問世。在這本探討明治時代